

漫说数字化时代的中古文献辑佚

陈 爽 (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)

陈寅恪先生曾说:“中古史之难,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,但有时足以反证,往往不能确断。”与其他断代相比,中古文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对匮乏,研究者对于文献辑佚也更为倚重。数字化为文献辑佚提供了利器,也使传统辑佚之学面临危机和挑战:表现之一,数字化检索极大提高了辑佚效率,但同时也降低了学人对纯辑佚类著述的需求,而且存世的佚书和佚文数量有限,不能保证充足的资料来源,限制了学科的稳定增长和成果输出,辑佚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下降,面临增长的极限;表现之二,手工翻检时代的辑佚成果质量参差,大多与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相去甚远,越来越从宝贵的学术遗产变为沉重的历史包袱,让当代学人在尊崇旧著、勉力订补还是另起炉灶、重回原典之间难以取舍。

在数字化时代,辑佚之学应该定位于为文史研究者提供线索和导引的辅助手段,而非画地为牢的所谓专门之学。在时下通行的文献学论著与教材中,辑佚已成为与版本目录、校勘等并列的分支学科。然而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,其发展必须具备丰富的资料来源,能够提出新的问题、产生新研究范式,并有相对稳定成果输出。我们今天面对的文献环境,与前辈辑佚家并无质的不同,完全可以越过前人,直接面对汉唐典籍,而无需在旧辑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。现在已很少有专门的辑佚学家,对从事文史研究的一线学者来说,辑佚不再是研究的目的,辑佚只是研究的基础和先导。

就中古文献辑佚而言,可以尝试在辑佚对象、辑佚规范、佚文的编次与考辨等方面做出改变,以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和新的研究需求:

其一,拓展辑佚的视野,将辑佚的对象由整部佚书的辑录转向零散佚文的搜求。传统辑佚的主要关注对象,是古代著录中的已亡之书,而对传世文献中的脱漏,并未予以足够重视。就中古文献而言,在最终形成版刻之前,大多经历长达数个世纪的手工传抄过程,写本时代除产生大量异文和错讹之外,文本的散佚也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。通过中古类书等文献的征引,

尚可见一些逸出传世今本的文字。以《太平御览》所引南北朝正史与今本比对,几乎每部正史都有相当数量的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或“准佚文”,少则数字数句,多则有数百字的完整段落,数量可观,都是学人罕有征引的“史料死角”。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和精密化的当下,无论是史传中记述史实的逸文,还是文集中失落的零散残句佚篇,都弥足珍贵。数字化检索使得全面而系统的资料清理成为可能,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,相互印证,让诸多“无版本依据”却“有文献可征”的佚文由隐而显,真正发挥其史料价值,应是辑佚工作的职责之一。

其二,改变辑佚的操作规范,由选择一本、“择善而从”转为保留众本、广列异文。古人引书有很大随意性,一条佚文往往有多书征引,无意的错讹和脱漏,有意的改写和补缀俯拾皆是。传统辑佚录文的通则是,主其一条,“择善而从”,即由辑佚者认定年代较早或内容较为完整的引文作为底本,以他书引文作为参校,这实际上使用的是校勘学中最危险的“理校”。无论是“底本”的选取,还是异文的取舍,都有相当的主观性和随意性。以南朝纪义《宣城记》有“临城舒氏女坐泉化鲤”一条佚文为例,在《文选》李善注、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寰宇记》诸书中凡六见,详略不同,文字互异,仅首句便无一条文字完全相同,如何取舍,令人莫衷一是。经过“辑校”后形成的录文,虽文字较为通顺,内容相对完整,却是一个非甲非乙的新本,按照时下通行的学术规范,在研究论著中甚至无法直接征引。有鉴于此,在数字化时代刊布成本大大降低的当下,可以尝试减少“择善而从”的主观按断,逐书、逐条地完整排比不同古籍中引用的佚文,使之最大限度保持文本原始状态,让使用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自行判断取舍。

其三、改变佚文的编次与考辨方式,由补缀文字、恢复旧貌转为分析文本,定位史源。传统辑佚每每以恢复佚书原貌为己任,旧辑本往往补缀文字,甚至改动原文,以呈现看似完整的历史叙述,却往往给使用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和误导。如汤球所辑诸家晋书、晋史和《十六国春秋》,其“校补”之功在当世曾广受推崇,按当今的学术规范衡量则弊端颇多。对于所辑录的佚文,传统辑佚的考辨方式通常止步于校订真伪,剔除窜乱。而在数字化时代,可以尝试通过数据挖掘技术,对数种同源文本或“平行史料”进行细致对勘,梳理有承继关系的史料群中的相关文本,尽可能追根溯源。通过文本来源的精准定位,将辑佚引入研究层面。

期待更多的中古文献研究者,以辑佚为手段、为线索,发现更多沉睡在“死角”的中古文献,激活它们,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。